

俄罗斯

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俄罗斯学界以探索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为立足点，围绕着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力、资本逻辑全球化及其危机形式、后资本主义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与替代道路等宏大主题而展开。莫斯科大学校长 B.A. 萨多夫尼奇在以“21 世纪的马克思”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也不应该追求垄断性的地位和穷尽真理，但在学术研究和教学过程中忽视这个流派也是无法容忍的。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及其《抉择》依然是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辩证法、复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思想重镇，乌拉尔学派通过对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进行的人道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历史哲学定位，将辩证法与其他哲学流派（人格主义、存在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解释学、现象学）相结合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比较活跃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与乌拉尔学派在反思苏联哲学、回到马克思的主张下，通过多年的学术积淀和路径探索，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核心学者和研究领域，有依托的组织机构和学统传承。除此之外，当代俄罗斯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思想路向，还包括以科索拉波夫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带有强烈斯大林主义色彩的极端派，如波波夫等人；以卡拉—穆尔扎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以沃多拉佐夫、斯拉文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马克思主义。

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抉择》杂志向俄罗斯著名学者和青年人征集关于马克思思想遗产五个问题:问题之一“卡尔·马克思的(a)哲学(b)经济理论(c)社会—政治思想遗产中的哪一项最经得起时间考验”;问题之二“你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之三“近十年来国外的与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有了哪些新思想与研究,你认为对于 21 世纪社会科学与实践有什么重要意义”;问题之四“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是什么”;问题之五“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你的个人命运与事业发挥了什么作用”^①。

科尔加诺夫将上述问题概括为“没有马克思,现代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具体回应如下:

问题之一: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如果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基于以往所有哲学发展的经验,具有极其可靠的思想基础,那么他的经济理论研究受制于历史经验的限制,需要调整或修订。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其背后的价值劳动理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以及历史趋势与危机分析、虚拟资本、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展开与发展,换言之,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都证实了这一点。

问题之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不能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性的反驳,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即反资产阶级)革命相互交织的特殊方式展开,无法同时解决发展资本主义并推翻资本主义这一复杂情势,从而导致了革命目标的内在冲突。事实上,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外壳之下展开的,虽然现代化所需的物质基础得以建立,但是却无法为社会主义提供完备的社会基础,僵化的官僚制度从底层破坏了民主机制,其社会主义取向仅仅基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惯性。俄罗斯社会主义实践的物质、经济和社会先决条件不足,只有工人阶级从底层展开运动,才能将群众利益置于国家政策的首位。所有这些分析完全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的悲惨经历证实了这一点。

^① 详见《抉择》2018 年第 2 期。

问题之三：首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得到深入发展，《资本论》作为辩证法的积极贯彻在 21 世纪资本主义批判中获得了拓展和续写。这项研究在俄罗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都在持续进行。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世界体系的现实展开中获得发展的，将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化把握为生动的概念体系，以理解各国社会经济系统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条件（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现实基础）。最后，围绕资本主义技术—经济基础的现代转变，展开对社会主义先决条件形成过程的研究。

问题之四：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欠发达国家如何突破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限制、摆脱落后状态？在不过度消耗地球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如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外围国家如何摆脱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对中心国家的技术依赖、摆脱自身的边缘地位？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工人人数的减少，如何理解“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一概念？

问题之五：在大学里，《资本论》的辩证法深深地吸引了我，对于《资本论》预备手稿的研究使我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潜力，作为有活力的有机体不断与时俱进。我所从事的研究事业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之上。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O.И. 阿纳宁认为：从哲学角度将社会历史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以及人有意识地创造历史的前景，这一基本立场在今天比马克思的时代更加重要。不幸的是，这一把握社会进程的宏大方法论传统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社会科学中无关宏旨的小主题处于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被分裂为诸多学派或宗派，关注于长久以来失去现实性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断裂，试图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分离出严格的、局部的经济理论，歪曲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遗产的个别主题在其他社会科学中发展起来，而在经济学中却是滞后的。自马克思时代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必须重新思考马克思遗产中的社会政治思想，以及个别社会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前的论点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激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源泉，苏联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和抉择，马克思主义对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决定性影响。然而两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苏联社会主义各阶段为了适应政治需要以及客观原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解释，但是在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并失去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视域与现实任务。马克思主义是 20 世纪以来社会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

思潮，并在社会科学中获得了社会地位成为科学分析的严肃主题，但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世界的理解更为温和，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断裂。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分析这些矛盾的长期动态演进及其关键性客观因素、理解社会形式和机制的可能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我的世界观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我从来没有后悔或抛弃它，作为它的学生，我们低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本身所蕴含的批判原则，以及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的比喻。在今天我更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比喻为一块合金，在统一的社会哲学概念框架中将各个理论部分联系为一个完整的综合体。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 Г.С. 毕思凯的回答如下：

问题之一：马克思没有过时，因为资本主义没有崩溃，我们尚未摆脱马克思所描述和阐释的西方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模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将社会生产力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不可避免的革命环节在于：人在创造性地改变外部环境的同时，其自身也不断发生着深刻变革。今天大多数拥有正常思考和行动能力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也有很多人认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对市场经济作用以及发展体系的分析，但是却忘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在于扬弃资本主义制度。虽然瓦解对抗性社会关系这一主张还没有得到实现，但马克思仍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问题之二：马克思主义作为复杂的理论体系，建立在对人类未来现实发展过程的预测基础上，目前最刻不容缓的任务在于延续十月革命的成就与口号，加强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即建立世界公社（虽然尚未发生），这一观念依然得到社会激进群体的强烈支持。

问题之三：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个体的生命活动及其自我价值的实现，是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现实运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甚至超过了30年代、70—80年代水平，物质—技术基础（事实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工业经济）被建立起来。需要吸取的教训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工业发展阶段抵御敌对阶级的威胁。

问题之四：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关注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凸显和深化；世界中心—边缘的冲突；无产阶级的转变；无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社会主义的改造理论等。马克思基于人在

劳动产品中对象化自己的本质力量，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本身。因此，根本问题在于人如何利用自由时间，能否寄希望于从财富需求中解放出来，通过劳动获得自我实现？

问题之五：首先是苏联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普通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这些课程的数量与质量都不差。二十大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教科书，但列宁格勒州立大学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讲座内容，不足之处在于缺少对于替代性模式的实质性把握，目前大学的现代哲学多元化教育显然为学生提供了各种无意义的观念。批评斯大林主义是必要的、合理的，然而更需要对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集权特征展开严肃讨论，特别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突然陷入军事冲突，为什么苏联在中欧遭到抵制，不被更多的西方国家所接受。怀疑一切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原则，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对于自身所处境遇和历史道路的重新思考已然滞后，马克思不应该受到指责。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 М.И. 沃耶伊科夫的回应指出：

问题之一：恩格斯将马克思最重要的两个基本立场概括为：剩余价值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其他陈述和规定，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获得什么样的意义，都无法与上述两点具有同等重要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集中、平均利润率下降、社会革命理论等，都不能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进行孤立地研究，尽管这些理论非常重要，但其仅仅作为上述两个立场的结果，或者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条件下来进行具体的讨论。历史唯物主义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需要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即已经存在于旧的（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框架之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现代生产的全球化趋势形成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与相互关联，社会主义成为大多数国家现代历史进程的一个特征。在过去 100 年中马克思主义立场始终如一。

问题之二：如果严格遵守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就很难解释 1917 年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实践。俄国革命发生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极低。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只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首先是克服封建主义残余。如果 1917 年的革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由此产生的苏维埃是社会主义的，那么经典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至少需要尝试淡化历史唯物主义。直到 1917 年，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俄国未来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问题。只有列宁在 1917 年 4 月表达了“将权力移交无产阶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尽管他也提出保留意见。如果我们认为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就不得不承认它并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来实现，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错误的。承认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性质的最有力论据之一在于将其分为两部分：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然而，这种分裂无论是从理论方面还是从经验方面都将受到质疑。从理论上讲，从二月到十月的短暂时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先决的经济条件。根据经验研究革命，这明显是一场革命，但包含两个阶段，从二月到十月革命局势不断紧张、扩大和深化，并最终完成了二月革命的任务。十月革命没有解决、也无法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点在 1991 年后尤为明显。斯大林决定性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立场，无法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农民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应该放弃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将苏维埃社会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解。

问题之三：20 世纪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为社会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资本主义的存在需要外国市场进行资本积累，将剩余资本转移到非资本主义经济区（殖民地、经济落后的国家、非资本化农业部门等）实现剩余价值。上述立场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资本主义主要内容不仅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且是对殖民地和落后地区的剥削；第二，由于存在非等价交换和非均衡体系，资本主义仍然具有蓬勃发展的空间；第三，封闭的资本主义体系无法存在（或所有国家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导致其体系的自动崩溃；第四，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加速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解体。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自我崩溃的判断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受到质疑。但是如果否认罗莎·卢森堡的公式，就不得不假设资本主义本身是顽固的，不包含导致其自我崩溃的客观原因。因此，辩证把握资本积累理论在于，资本主义本身不是永恒的，但需要它的掘墓者，而现代经济学很难掌握这一理论。随着经济发展，各种社会创造性活动的数量和价值增加，同时经济因素的价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对市场机制调控能力的要求增加。人类活动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其中心不是经济效率，而是社会（文化、科学、教育、人道主义等）的发展目标。这意味着需要加强政府有意识、有目的调控和监管社会经济过程的能力。当发达西方国家转向“知识社会”时，以创造性劳动（科学、教育、文化）为主导的人

类活动领域在新的社会经济科学中成功地发展起来。经济活动不仅仅局限于市场，而是越来越涵盖广泛的人类活动领域。成本和劳动结果不仅可以用金钱来表达，而且可以节省时间和努力，获得更多的快乐和幸福。这意味着当今越来越接近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

问题之四：现代资本主义金融化意味着，金融部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具有独立性。尽管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放弃为市场经济辩护，更多借助国家的作用来遏制金融危机，随着金融货币体系监管的日益严格，长远来看将推动计划经济的发展，这是苏联的特征，理论上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如果货币不再是商品，而是从属于国家监管，这意味着市场的主要构成要素被淘汰。现代经济危机不是销售和过剩的危机，而是流动性过剩的危机。垄断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转型的根本基础，大公司的股权分散而没有真正的所有者。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企业部门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基础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官僚结构的治理。

问题之五：在我自己的人生和学术命运中，马克思和他的创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教我“翻阅书籍”，教会我思考和理解我周围的世界。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莫斯科国立大学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Д. В. 贾巴罗夫的回答如下：卡尔·马克思思想的真理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一陈述不仅涉及政治和经济，也涉及其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马克思的方法论使我们能够理解社会生活的内在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趋势，运用这一方法研究当今社会经济系统，对于寻求未来社会图景是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理想是对公正自由的渴望。就此而言，“现实社会主义”尽管在形成过程中遇到困难，却构成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有必要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完成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二是分析和理解苏联社会。学者们对第一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把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必要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如何运作，工作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等。我希望马克思的思想能够在今天得到发展，他的继承者不会教条地接受他的假设，而是通过发展马克思的思想，找到新的规则和方法来改善我们的社会。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授大卫·科茨的回答如下。

问题之一：马克思创制的大部分经济分析理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1)

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关系而不是片面的因果关系，仍然是理解人类社会较长历史时段主要变化的强大理论方法；(2) 发展阶段的概念：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连续历史阶段，简单合作、制造业、现代工业。这样的阶段分析对于了解特定社会的经济体制具有重要价值；(3) 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首先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目前仍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体系；(4) 利润分配理论：马克思对资本利润分配的分析，新古典理论将个人选择和效率最大化作为理论预设，没有在根本上把握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5) 资本模式： $\Pi - T - T' - \Pi'$ 仍然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最好基础；(6) 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竞争导致资本积累和技术发展；(7) 危机理论；(8) 货币；(9) 集中和集权：竞争导致资本集中；(10) 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马克思的一些具体陈述没有经受过时间的考验，包括危机理论；成本和价格；在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中马克思强调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作用，应该通过性别、种族、民族和国家等关系和角色来补充；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消费社会。

问题之二：马克思未详细描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现实社会主义”包括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如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计划等，主要问题在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

问题之三：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所提出的社会结构积累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变化的经济学基础、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

问题之四：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在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在现代世界中占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抵制这种错误的主张，建立可持续的后资本主义制度愿景有助于增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力。

历史哲学系副教授 P.C. 奥辛的回答如下。

问题之一：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一种理解现实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辩证法）的本质在于将现象把握为不断发展的过程，发展是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实现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替代。辩证法旨在把握现实运动的根本原因，而不是重构各种主观现实（话语、意见、立场）等等。马克思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而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转变，生产技术社会化使计划因素提高、竞争和市场要素降低。与此同时，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商品—货币关系不仅渗透到劳动领域，而且渗透到个人关

系、道德、文化、休闲等，完全服从资本自我扩张。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没有消失。

问题之二：真正的社会主义涉及理论与实践。苏联作为“早期”社会主义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在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是在没有资本支配的情况下进行的。主要错误是 20 世纪 60 年代通过引入市场管理方法来改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至少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任何新事物的形成并不顺利，现在我们生活在由反革命引起的资本主义复辟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埋葬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相比，现代俄罗斯资本主义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失败的。

问题之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问题之四：面对现代公众，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基本矛盾的清晰描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与机会主义思潮进行理论斗争。

问题之五：我对马克思的政治和经济思想感兴趣，尤其是克服社会不公正思想。马克思主义成为我研究现代社会、理解其基本规律的方法论武器。我在大学期间就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并公开发言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

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系副教授 M.IO. 帕夫洛夫的回答。

问题之一：几乎所有西方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都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的思想。似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却被拒绝，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马克思的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物质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是时间和空间）。

问题之二：苏联思想家一直把马克思视为理想主义者，布兹加林强烈批评在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意义问题上对马克思做理想主义的解释。

问题之三：目前在这个领域作出巨大贡献是以布兹加林为主导的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问题之四：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目的是成为一个创造者，与自然和其他人联盟的创造者，资本主义是有历史限度的，“史前史”作为“必然王国”，个人在其中受制于外在的强制性，“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是历史展开的必然趋势。

问题之五：1992 年，我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年级学生，我们是苏联解体后第一批学生，但是我和同学依然选修了课程“从斯密、萨伊到马

克思”。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经济学经济理论系主任梁赞诺夫的回答如下。

问题之一：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方法经受住了考验并证实了自身的优势。

问题之二：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改变内、外部条件的调节潜力，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过程尚未充分展开就被过早地定义为瓦解的开始。苏联时期生产方式的特点在于，它在被社会主义性质所规定（国家、生产资料所有权、计划、社会发展目标的优先权等）的同时嵌入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系统，这种异构性因素及其运用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来实现的。历史实践表明，国家利用市场关系本质上是“集体资本家”为社会利益服务，苏联没有能力避免过度国有化和官僚主义的危险。

问题之三：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关注两方面，即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扩张及其后果应该成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对象，需要对已发生并正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经济事件及其变化作出回应，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即以新的理论范式替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而言，重要的是建立和保持与当代思潮进行对话的能力，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发展“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关键任务。

问题之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当代发展对全球化进行了更深入、更丰富的分析，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新的系统现象，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运动，产生了哪些经济和社会后果？分析金融资本、全球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影响，新技术作为革命力量对于经济活动、社会劳动以及资本主义前景的影响。另一重要的领域是对于后资本主义替代性道路的研究，分析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以及 20 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客观分析和把握阻碍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原因。

问题之五：列宁格勒州立大学经济系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学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教育，使我能够在现代性背景下对时代本质及其内在矛盾进行分析和判断。

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斯拉文的回答如下。

问题之一：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几乎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除了与欧洲革命预测有关的具体问题、绝对贫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消失等。被完全证实的理论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资本内部的自我否定

性、剩余价值作为劳动剥削机制的概念、劳动的双重性、将共产主义理解为完成的“人的解放”，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过渡性质等。

问题之二：需要深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社会主义自治理论、现代全球资本、剥削知识分子的本质、智力劳动等。我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尝试呈现马克思社会理想的本质和意义，分析人类的历史及其未来，揭示国内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缺陷，分析苏联的性质、演变和崩溃的原因，以及列宁对马克思思想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苏维埃社会主义模式的内在困境。

问题之三：关键问题在于分析工人阶级陷入被动状况的原因；充分展示现代俄罗斯人的反抗精神；面对全球危机，左翼运动应当采取怎样的战术；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条件；寻找现代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带。

问题之四：我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革命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及思想在我个人的命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资本论》及其当代价值

马斯托·马塞洛在《〈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始与结构》一文中，详细梳理和分析了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筹划预备手稿的过程，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资本论》研究的整体性架构、丰富并夯实核心概念。^① 作者指出，真正促使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契机是1857年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马克思确信这场危机为推动整个欧洲新革命创造了条件，并通过阅读黑格尔“逻辑学”为写作1857—1858手稿寻找灵感，与之前摘录的经济学家作品摘要、大量记录不同，马克思从各种日报中搜集与经济危机相关的主要事件，通过股票市场了解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汇率波动。

马克思的“计划”分为三个部分：方法论的“导言”，处理货币和价值的“货币章”以及关于资本生产过程和资本周转的“资本章”，同时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剩余价值和经济形态概念。1858年2月底，马克思在给拉萨

① МУСТО МАРЧЕЛЛО, НАПИСАНИЕ “КАПИТАЛА”: ГЕНЕЗИС И СТРУКТУРА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КРИТИК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8, No2.

尔的来信中写道：“事情进展缓慢，因为一旦你多年来研究了一些方面，就会有更多新的方面需要研究。”然而，没有迹象表明本次危机能够引起马克思期待已久的革命运动，他无法完成多年来形成的工作计划，因为距离手稿中讨论主题的最终概念相差甚远。《计划》只是一个草案，1861年8月马克思再次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1863年6月他写了23本厚厚的笔记本，包括货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最重要的是关于经济学家尝试解释剩余价值的各种理论。他的目标是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他计划工作的第一部分。这本书出版于1859年，包含第一章“商品”，区分了使用成本和交换成本，以及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马克思在导言中说：“我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顺序如下：资本，土地所有权，工资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两年后，马克思的计划并没有改变：他仍然要写作六本书，每本书都聚焦于其在1859年列出的一个主题。

然而，从1861年夏天到1862年3月马克思开始致力于新篇章“资本论”，专注于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特别是：(a) 将货币转换为资本；(b) 绝对剩余价值；(c) 相对剩余价值的研究。“计划”中所涵盖的一些主题已经具有了分析的丰富性和准确性。在春天，马克思开始研究新的领域：剩余价值理论，计划将其作为“资本论”第三章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马克思的十多本笔记明确地解释了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剩余价值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有这样一个错误，即以纯粹的形式考虑剩余价值，而不是以具体的利润和地租形式”。在笔记本VI中，马克思首先批评了重农主义，作为“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重农主义的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奠定了基础，他们不是“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中寻找剩余价值来源，理解“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重农主义错误地认为“农业生产”是“唯一的生产劳动力”，“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剩余价值被视为“自然的恩赐”。在笔记本六的后半部分集中讨论亚当·斯密，认为斯密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在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特殊性，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局限性在于他无法区分“剩余价值本身”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的具体形式”。

马克思在写作期间经济窘迫，他继续写了笔记本XI、XII和XIII，专注于地租理论，马克思批判性地研究了约翰·罗德伯特的思想，分析大卫·李嘉图的学说。XIV和XV两个笔记本对经济理论家的学说进行了广泛批判性分析。

在笔记本 XVII 中，马克思回到商业资本问题和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流动资本。在笔记本 XVIII 中马克思将“第一部分 资本生产过程”划分为：(1) 简介，商品，货币；(2) 货币转换为资本；(3) 绝对剩余价值；(4) 相对剩余价值；(5)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比率；(6)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韦克菲尔德殖民理论；(7) 生产过程的结果；(8) 剩余价值理论；(9) 生产理论和非生产性劳动。马克思并没有将自己限制在第一卷，而是制定了“第三部分”的计划：“资本和利润”，主题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 将剩余价值转换为利润，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相反；(2) 利润转换为平均利润；(3)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4) 地租；(5) 李嘉图租赁理论的历史；(6) 利润率降低的规律；(7) 利润理论；(8) 将利润划分为工业利润和利息；(9) 收入及其来源；(10)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货币回流运动；(11) 庸俗经济学；(12) 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在 1863 年 1 月的笔记本 XVIII 中，马克思继续分析交易资本。他完成了笔记本 XX 和 XXI，致力于研究积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和形式从属关系、资本和劳动的生产，他的观点与当时研究的主题相关，即剩余价值。同年 5 月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研究波兰问题，收集了另外八本笔记本中的工作笔记，总结了 18—19 世纪经济研究的理论成果。7 月中旬致力于分析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在笔记本 XXII 中研究魁奈的《经济表》。然后写作了 1861 年系列中的最后一个笔记。经过两年的努力，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家进行更深入的批判性研究后，比以往任何时刻更有决心完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虽然他尚未完全解决许多概念及其描述性问题，但历史部分的完成促使他回归理论问题。

1863—1865 年是马克思新的工作阶段，致力于研究劳动的不同规定性，为第一卷奠定基础，研究第三卷的主要部分（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以及第二卷的原始版本（资本流通过程）。至于 1859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宣布的六册计划，马克思提出了一些与地租、工资相关的主题，这些主题最初是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提出的。马克思在整个秋季专注于第一卷的写作，他的健康状况开始迅速恶化，在经过五个月的强制休息后，1866 年 4 月中旬恢复工作，马克思把精力集中在第一卷上。8 月开始了写作第三卷的新阶段，即第二部分“利润转换为平均利润”以及第一部分“将剩余价值转换为利润”。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会议，并在会上就 10 月份的现状发表了开幕词。恢复工作后完成了第三卷第三部分“利润率趋势递减的规律”。从

1865年1月到5月马克思致力于第二卷写作，手稿分为三章，即恩格斯1885年印刷版本的一部分：(1)“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2)“资本周转”；(3)“整个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在第一卷和第三卷中提出了新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

1865年3月21日编辑同意出版马克思的《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同年春末马克思撰写了第三卷的第四部分，题为“商业资本”。1865年7月底，马克思向恩格斯发送了一份新的报告，其中包含3个新的章节，完成了理论部分（前三本）。第四本与前三本相比将是最容易写作的，因为所有主要问题都已在前三本书中得到确认和解决。马克思始终坚持，无论手稿中的缺陷是什么，其优点在于它的整体性，只有在充分准备好之后，才能完全实现写作目的。1866年初马克思重新进行第一卷的工作，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开始发售，最终修改后目录如下：前言；商品和货币；货币转变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资本积累的过程；第1部分的附录；成本表。1867年10月，马克思重新回到第二卷的研究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继续研究资本。1875年为第三卷撰写了另一份手稿，1876年10月到1881年初准备第二卷的新章节。一些信件表明，马克思一直准备着修订第一卷。当今旨在用以本质性概念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无法绕过马克思的资本概念。

萨米尔·阿明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工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早期的社会形态进行严格的科学分析。^①第一卷揭示了商品私人所有者之间进行交换的社会性质（这种特征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所独有的，尽管商品交换早先存在），即抽象价值和社会劳动的出现和支配。抽象价值的主导地位不仅限制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再生产，而且支配着全部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并作为意识形态机制使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性得以巩固。因此，在资产阶级思想范围内无法触及《共产党宣言》的核心问题，即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性和可能性问题。阿明进一步呈现了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转向研究资本主义历史运动、关注不平等发展概念以及不同转型路径的学术路程，试图阐明在“中心—边缘”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革命路径或颓废路径对于内在矛

① АМИН САМИР,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МАНИФЕСТ, 170 ЛЕТ СПУСТ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8, №3.

盾挑战进行应对的可能性。并且认为，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漫长道路上，革命性突破可能只在外围开始，那些具有先锋队意识、无法通过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则需要推进向社会主义性质的转变，列宁和毛泽东实现了这一信念。

阿明认为我们的时代已然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环节：社会主义转型必然会通过反击世界帝国主义“在一个国家”发生，不会有“世界革命”。因此，走上这条道路的国家将面临双重挑战：面对帝国主义势力发动的持续战争（热或冷），成功地将大多数农民联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宣言》以及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对此问题发表意见。因此，需要重新思考《宣言》中的农民问题。马克思处于欧洲尚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大部分农民在捍卫私有制的阵营中成为资产阶级的盟友，成为无产阶级的反对者。然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心从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转移到依附性的外围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问题的性质。尽管如此，只有社会主义先锋队能够将大多数农民团结在一起，将反对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目标转变为政治实践，并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取得革命的成功。

Г. В. 洛巴斯托夫将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改造和运用作为理解和把握《资本论》当代意义的切入点。^① 我们生活在一个空间世界中，但这不仅是一个几何学的抽象空间，而且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以及马克思的方法论向我们所揭示的世界历史展开的逻辑结构。作为在世界历史中存在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充分占有和发展了之前的人类思想，并非无意识地被人的历史活动所复制，也不是试图以自己的能力再创造自己的形式，而是在接受和超越前人活动的基础上，以新的文化形式和历史现实发展自身，人既是历史活动的结果也是前提。马克思的方法不仅是研究方法，而且是世界历史展开的形式本身，黑格尔以纯粹逻辑的形式在历史哲学中呈现了这一变动结构的可理解性。当人思考现实，人的历史性活动已经包含在认识形式之中，这种绝对形式的力量是改变现实的人的力量。黑格尔认为，哲学史不仅赋予人以理论思考能力，而且是人类发展的真实历史，这个过程的客观性体现在逻辑概念运动的普遍形式之中。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形式不仅仅存在于概念的领域，而且是现实中人的历史活动

① ЛОБАСТОВ ГЕННАД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ПУТЬ К СВОБОД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КАПИТАЛЕ”),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8, №3.

过程，理论的意义则在于表达那个特定时代的内在本质。经验主义的解释模式缺乏理论能力，将自由解释为工作和失业之间、善恶之间、真理和欺骗之间的二元对立。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被证明是最严肃和最深刻的学术主题，马克思则将这门科学建立在资本范畴逻辑结构的现实运动之中。

三、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研究

布兹加林认为，在今天思考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首先需要回答“谁以及为什么需要马克思”？答案是那些不接受异化的、分裂的生存状况、渴望把握当代社会发展规律的人。后现代主义从逃离“宏大叙事”到解构真理、去主体化，在本质上却是以激进话语维护现存的异化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将自由理解为联合活动，这意味着整个人类在进步的方向上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拒绝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巩固异化世界，这是极其危险的。我们需要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把握资本主义的深层矛盾及其发展形式；分析全球化的原因；金融化、现代性和生态环境危机的本质；寻求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替代方案。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中寻求理解社会生活本质的思想，能够为以下问题找到根本答案：（1）如何理解人类社会历史与生存空间中经济、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尤其是如何理解俄罗斯所处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是什么，它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而且应该成为过去？（2）是否存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存在，是什么？是否有可能理性地筹划社会未来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依靠超级计算机对未来进行预测？（3）谁在世界上和在俄罗斯拥有真正的政治经济权力，对这一世界的真正掌控者与国家追求的利益是否一致？从谁的角度来看，什么是“更糟”和“更好”？（4）现代社会的内在结构是什么？为什么不平等如此深刻和不断增长，不仅在收入方面，而且在生活质量、获得发展资源和社会财富方面？^①

当今世界正发生巨大的实质性转变：替代性社会制度的发生，地缘政治分布的改变，对资本扩张进行生态的、社会的、人道主义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停滞不前，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葆有其生机活力的必要条件，社会哲学—

① БУЗГАЛ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БУДУЩЕЕ МАРКСИЗМА И МАРКСИЗМ БУДУЩЕГО,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8, №2.

方法论、政治经济学、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发展方向，其中方法论是最重要的。近几十年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美国、欧盟国家、拉丁美洲以及中国，特别是对一般方法论和辩证法问题缺少关注。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方法论，在哲学领域中是后现代主义，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是数学建模，在政治学领域中则是实证主义，上述状况是极其危险的。后现代主义消解宏大叙事、转向对各种语境和概念的文本分析，不仅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导致理论研究放弃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实践任务，即寻求通往自由王国的现实道路。马克思主义立场需要分析现象的本质、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内容，探索社会进程中内在固有的矛盾及其演变、进步与衰退，特定社会制度及其现象的衰落和消亡。所有这些都表明需要创造性地开发、发展和持续使用辩证方法。在苏联和现代俄罗斯保留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方法学领域的成就（其创始人被认为是伊里因科夫）。

历史哲学和社会主义运动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方法论取向导致学者们回避了历史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即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研究社会经济转型与改革理论及方法在最近几十年实践中是丰富的，然而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社会革命问题却被束之高阁。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反思得到了发展。最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阶级结构、政治权力架构、意识形态与文化等社会结构各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基本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新生产力与过时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问题已被列入议事日程。今天我们需要新的“21世纪资本论”，它回答关于市场、货币、劳动、社会结构等的本质问题，这些核心的经济范畴与150年前马克思所处时代有何不同，以及自动化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否达到了最高点。

布兹加林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经验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首先体现了国家成就在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飞跃，为社会主义开拓了的新路径，世界各国学者正积极探索中国经验。俄罗斯学者认为，这是市场和计划相结合、渐进转型道路的成功。但是在中国依然存在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商品经济的市场取向、货币拜物教、经济利己主义、消费价值观、追求货币财富最大化、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积累等问题。资本主义市场化的经济组织方式与社会主义发展任务之间依然存在矛盾，后者意味着加强社会团结、提高创造性活动、激发公众热情、提升

文化价值等，消费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这并不意味着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应该放弃使用资本主义手段，在创建新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将其作为经济激励方式之一。新的社会秩序是在旧体系中诞生的，保留并扬弃了旧体系的积极方面，即社会主义道路占主导地位，市场和资本在社会的控制下运作。希望未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获得更加深入和强大的发展动力，面向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思想文化的发展需求。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方法论和理论工具，不能成为教条主义或思想强制，而应该与其他社会思想展开创造性对话。目前在世界各地大学和研究中心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不但与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而且在社会理论类型方面与其相悖。抵抗这种敌对的世界环境是极其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力量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育的支持变得非常重要，需要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对公众进行理论指导，发展世界社会主义思想。

布兹加林将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基本方法概括为，广泛地运用辩证法，包括进步辩证法和退化辩证法，所谓“退化”是与“进步”相对的概念，包括逆行（反向）进化；以建构性方法更加细致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理论，尤其是在克服异化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问题；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商品、市场、货币、资本、剥削关系等基本范畴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金融化、全球化、普遍剥削等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危机的客观矛盾和主观矛盾，挖掘其积极内涵；将 21 世纪社会主义视为社会解放的曲折进程，即不仅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辩证否定，而且是对整个社会异化体系的否定。

首先，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和理论基础方面不仅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而且借鉴了列宁、卢卡奇等学者的理论，在分析进化问题、线性发展的同时引入关于退化的辩证理论、突变理论，以及社会制度产生、发展、变化、衰亡的辩证法。不仅关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而且研究从“必然王国”、异化世界向“自由王国”的过渡问题，这一过程是长期曲折的，包含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并且具有全球性特征，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具体进程有所不同，整个 20 世纪的人类历史都处于这一曲折运动之中。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之前这一进程处于上升发展阶段，尽管也有过剧烈

波动（法西斯主义，欧洲、日本、拉美等国的反动政权等），同时伴有积极的改革（西欧的社会民主转型，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等）。进入 20 世纪晚期逆向倒退趋势日益凸显，异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霸权问题日益尖锐，但是在中国、拉美和其他国家出现了反向趋势。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有两个主要分支，其中之一主要关注文化问题，代表人物布拉夫卡—布兹加林娜；另一分支重点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矛盾。尽管该学派在研究特色上具有某些共性，但是有独立学者所构成的开放的学术群体。

巴拉什科娃总结了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成就，即对马克思《资本论》基本范畴的核心要义进行当代阐释^①。布兹加林、科尔加诺夫、沃耶伊科夫等学者致力于重新阐释市场、货币、资本等范畴内涵。21 世纪，全球市场已经全面网络化，大型跨国资本集团全面控制了市场领域。拟仿消费兴起，鲍德里亚将其称之为符号消费。货币已经成为伪造的虚拟资本。剥削关系涵盖形形色色的资本霸权统治，半奴隶性的个人依赖是资本主义剥削产业工人的“典型”途径，以各种方式攫取垄断（帝国主义国家剥削边缘国家）利润，对创造性活动采取新的剥削形式（对人类的创造能力和共同文化财富进行全面剥削），并最终引起了积累关系的转变。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将资本主义晚期或“必然王国”时期的资本积累规律把握为：一方面资本霸权持续扩张，而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创造性活动不断进步，二者成反比，上述趋势不仅加深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人、自然与社会之间，人、自然与资本之间的矛盾。究其本质，这种矛盾是生产力和资本全球霸权之间的矛盾，而资本全球霸权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已经过时。

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基于对晚期资本主义特征的辩证分析，认为当下全球经济状况以及各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在根本上并非政府和经济家的政策失误，而是由过去几十年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所导致的。必须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工具分析当代经济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原因：生产力的哪些变化将构成对新自由主义的限制，从而使金融化、反工业化、核心国家对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剥削以及各种新的剥削形式（非常态）得到控制；生产关系的哪些变化将会取代新自由主义，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 21

① 关于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思想主张，详见复旦大学首届“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国际论坛”论文集中的《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当代问题的反思》（布兹加林、巴拉什科娃著）一文。

世纪的人类进步开拓空间。

基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体用关系的辩证分析，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未来可能的发展状况进行了预测：(1) 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生产关系推动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和社会人文进步，催生了新型生产力，并为向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创造条件。(2) “黄金时代”结束，新自由化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开启，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受到遏制，生产关系出现倒退，生产关系作用于生产力，使得生产力结构发生扭曲，客观上导致再生产劳动越来越多地被创造性活动取代，生产自动化和机器人化越来越集中于数据信息的创建、储存、处理和传递领域，并为金融资本等行业的优先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抑制其他领域生产力的发展。(3) 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创造性革命”生发的土壤日渐形成。这一进程反向作用于生产力，凸显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技术、社会、人文进步的整体局限性，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局限性，使得破解三十年前早已形成的生产关系难题更加错综复杂。(4) “资本主义社会化新浪潮”缩小了收入差距，提升了生产关系，为新型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为大规模、全面的创造性活动的发展创造条件。20世纪50—70年代资本主义为解决这一历史性难题所作出的努力已经止步不前，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来临，资本主义将再次面对这一难题，而关键在于资本主义能否通过内生力量形成新的社会关系。

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改革是深层次的，即将资本集中控制的大部分经济政治权力和财富重新进行社会分配。这些改革措施应当强化（而非像过去几十年那样阻碍）20世纪初资本主义内部出现的后市场和后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特征及其过渡形态。这些新形式能够在短期内部分地解决现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技术、人的存在、社会新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人类进入后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化改革应当有助于发展新型生产关系，从而为人在当代社会、人与自然再生产过程中充分发挥创造性提供广阔的空间和驱动力。社会化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 优先发展将人从再生产功能中解放出来的物质生产技术。(2) 优化社会生产结构，使之有利于群众的创造性活动，解决生态—社会—人文(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医疗健康、科学文化、自然社会关系重构)综合发展的问题，缩减无用行业，发展物质生产，为创造性行业的发展创造条件。(3) 保持社会上升通道畅通，持续渐进地调整现有就业结构，让更多人投身创造性行业。切实保障起点公平，激发和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创造潜力。(4)

提升文化福利的普惠性，让每一位现有的和潜在的创造主体都能够充分施展才华。(5) 扩大创造性公共福利生产的领域，加大公众监督力度，抑制集体资本对经济的操控。上述改革并不动摇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但要求对其进行深度调整。布兹加林认为，当今世界正在进入生产力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时期，哪种社会体制能够率先调整现有生产关系，使之与上述转变相适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超越，就将成为 21 世纪的领导者。^①

马克思的社会哲学遗产不是知识，而是关于社会现实的理论自觉及其理想主义，是关于人的存在的价值判断及其衡量尺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伦理方面与重商主义相反，人生的意义不是积累和消费，马克思对幸福的理解在于斗争，不幸在于屈服。马克思对于货币的态度始终具有平等主义特征，平等和社会正义在人类价值体系中占据首要地位。任何价值判断都不适合进行认识论证明，其普遍有效性及约束力在我们的世界中是理所当然的。

马克思在社会哲学、一般社会学和历史类型学三个层次研究人的社会实现，通过概念的逻辑运动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就社会哲学而言，马克思以人的生存方式（社会生活方式）为基础研究有机的社会现实（社会运动形式），社会有机体具有“从自身和为自身”的多样性。一般社会学层面的分析对象是社会作为一个组织存在的低级形式。马克思将其视为一群能够生产和创造其自身生存条件的人的组织方式，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结构，整合和动态。社会结构的必要元素（物质、组织、意识形态和社会）并成为任何子系统的基础，被称为公共生活领域：(1) 经济领域；(2) 组织领域；(3) 社会领域；(4) 精神领域。马克思的历史类型学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意义上分析各个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反对文化类型论及其派生思想对其思想的扭曲或简化，马克思从未剥夺人类精神的能动性，而是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动结构作为社会变革的深层原因进行研究，揭示社会变革的普遍机制。马克思的社会哲学和一般社会学思想的完整性，这构成了他学说的理论基础。

① БУЗГАЛИН А.В.1, МАСЛОВ Г.А.1, ДЖАББОРОВ Д.Б.1, БАРАШКОВА О.В.1, ЯКОВЛЕВА Н.Г.1, БУЛАВКА-БУЗГАЛИНА Л.А.1, СОЦИАЛИЗАЦ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ПОТЕНЦИАЛ,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ПРЕДЕЛЫ,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8, No4.

四、乌拉尔学派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乌拉尔学派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柳布金教授为核心在乌拉尔地区形成了两个研究中心，乌拉尔国立大学（现为乌拉尔联邦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与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哲学与法学研究所，代表性学者包括布尔哈诺夫、维尔什宁、维斯库诺夫、达维多夫、茹科茨基、康德拉绍夫、科里亚科夫采夫、什哈尔金等学者。^① 乌拉尔学派的思想阐释性植根于对社会活动的辩证把握，对“实践”的人道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历史哲学定位，学者们力图通过将唯物辩证法与其他哲学流派（人格主义、存在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诠释学、现象学）相结合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纠正苏联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回到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马克思主义。

柳布金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内部分歧的认识论根源在于，未能把握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矛盾之处。有必要严格区分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和他的众多追随者和拥护者的哲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观点的本质区别。马克思用哲学人类学方法来分析社会，以活动论为基础阐释人、社会和历史的本质，同时依循主—客观原则。而恩格斯主要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艺术哲学（首先是文学和音乐）等传统领域，最初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和辩证逻辑。因此，应该在统一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范式框架内，从历史哲学视角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进行综合解析研究。

柳布金基于马克思“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基础论断，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和人道主义思想并使之概念化，即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强调人的存在根本上由人与人、人与自然所形成的联系和关系所决定。康德拉绍夫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哲学进行了存在主义人类学解读，将其哲学思想看作完整的统一体，在这一统一体中，可以对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过程进行科学分析与存在主义分析，社会—历史存在的客观进程与具体历史条件下个体内心世界的感性（存在）被同时反映出来。这是由于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实践、活

^① 关于乌拉尔学派的介绍详见复旦大学首届“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国际论坛”论文集中的《马克思主义乌拉尔学派要论》（康德拉绍夫著，武卉昕译）一文。

动)看成是物质活动和心理活动的辩证统一,因此物质改造必然应当由心理(认知的、情绪的)活动来表达。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和话语体系中存在主义分析的目的在于,对个体知觉—情绪结构进行解释,对多样历史条件下个体自我存在进行解释。

科里亚科夫采夫认为“实践差别原则是马克思社会哲学之基本原则”,即强调社会实践的异化形式与创造性革命之间的根本分歧,依循这一原则,提出作为工业无产阶级社会政治实践批判概念—方法基础的“劳动批判原则”,进而使我们能够利用厚重的历史材料将异化劳动概念合理地解释为人类起源、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结构的直接前提,能动原则因此获得了发展。此外,科里亚科夫采夫和维斯库诺夫还提出了主动精神的类型学。

乌拉尔学派将马克思主义把握为能够与其他流派思想进行综合的、开放的理论空间。达维多夫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社会哲学思想进行理论整合,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之处,即马克思学说本质上是对劳动的全面批判,但同时又将无产阶级作为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主体,生活于19世纪的马克思无法预见21世纪的矛盾。达维多夫坚信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体无法由商品—货币关系决定,因此,社会主体并非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而是个体化的人,首要的是人的创造性活动和自我价值实现。基于“个体辩证法”,达维多夫将个体看成被改造的个人,即能够(超越自我利己存在)通过创造性活动表现个体本质的人。同时,个体的所有存在都是相互联系的,社会越无个性,个体就越缺少社会变革的创造力。

因此,达维多夫指出,当代社会为个体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当代社会越来越能够满足人的一般需求,但是人却将解放出来的时间更多地使个体退化,即在前革命的过渡发展阶段中,社会具备了保障个人基本物质需求的能力,但一般的物质利益保障只能促使社会向人格化(有个体创造力的社会阶层)和非人格化(无个性的,不具备创造能力的社会阶层)进一步分裂。这一分裂必然会唤醒个体的创造力,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并最终抛弃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外壳。

达维多夫通过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未来趋势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发展与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矛盾,认为不应当将这一社会状态理想化。关键在于,创造性活动不仅仅是人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活动,而且是产生新的异化形式的根源。达维多夫指出,即便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不会使人的劳动失去意义,但工

艺制造速度的提升会导致社会分层中“多余人”的增长，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不仅如此，人愈是摆脱手工劳动，各个领域中的竞争就会愈发激烈。因此，后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是对抗性的，但与阶级斗争不同，这一对抗性处于取得一定社会成就的阶层和普通阶层（“无个性的”）之间。对社会成员的统治取决于个体是否拥有最重要的“生产手段”——创建公共话语的声望和能力。达维多夫进而将争取创造性自我认同的斗争视为独特的“个体秩序”：在真正的技术时代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得尤为关键，这一阶段的伦理挑战在于能否创造一个孕育新型人才的、相互关联与统一的社会。西方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是自由创意个体网络联合体的普遍观念（实质上并不普遍）是一种乌托邦。在全球化技术危机时代，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会发展为全球灾难，因此需要扩展和重新界定国家职能，国家不但要为创造性活动的可能后果承担责任，而且还要在创造性活动竞争日渐激烈的条件下为个体的发展负责，解决创造性活动异化带来的后果。

在上述背景下，达维多夫洞见到了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衰落以及超人道主义思想普及的主要原因，前者无法应对后者的挑战。第一，超人道主义保证了个体最高价值的实现，确证其作出理性判断及为行动负责的能力，保障实现选择的自由（意志自由）；第二，超人道主义在逻辑上缘起于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坚持个人主义原则则会得出人的自由的必然性结论。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无法为人道主义奠定基础，因此必须以人格主义对其进行补充和替代。按照人格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人的演化是对创造性、自由以及与死亡斗争等能力的拓展过程，但同时也是为了永恒，为了确保人类历史的连续发展而进行的斗争（这必然意味着要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谨慎的方法来对待技术进步）。

科里亚科夫采夫与维斯库诺夫两位学者认为，哲学史不仅可以作为哲学方法史来加以考察，而且也可以被描述为哲学方法论体系，并且划分出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前辩证法（产生于古希腊时期）流派。辩证法作为新的思维方法在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启蒙时期的唯物主义框架中成长起来，经历了与德国唯心主义思辨传统相结合、与唯物主义传统相结合两个阶段。后一阶段的发端与费尔巴哈的理论活动密切相关，费尔巴哈首次在思辨层面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并以人类学（唯物主义）内容充实辩证法的思维范畴。费尔巴哈人本学哲学思想构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新方法范式，即唯物辩证法，但它却抛弃了社会实践，成为脱离实践的理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人本学、社会哲学和辩证法

是完整的统一体。

科里亚科夫采夫和维斯库诺夫两位学者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性质，即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非彻底的否定性，资本主义关系与非资本主义关系（主要是与官僚主义的关系）紧密交织，后者服从于前者。由此，《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思想获得了发展：当代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单晶体”了，它分裂为多种经济模式，包括 20 世纪被操纵的全球市场和以社会为定向再分配体系（缓释型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谱系的更替具有必然性，需要比“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二分法更为细致的社会学概念谱系。尽管从前的谱系坚持了正确原则，但因抽象性而显现出不足。如果当代社会确实具有不彻底性和过渡性特点，那么简单的二元划分无法反映出由于克服结构性危机而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作为社会革命的前提，将会创造出新的国家管理市场的“社会性国家”发展模式。

康德拉绍夫发展了柳布金关于人是马克思哲学对象的基本立场，强调在不同情况和语境中马克思关于人的普遍本质的不同界定方式：在本体论视角下，人是超越性的、而非本能的，即不受任何自然和意识的限制；在社会哲学视角下，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历史哲学视角下，人是历史性的存在；在存在主义视角下，人是苦难本身，是体验自我存在并乐观地对待世界的能力。但是，关于人的普遍本质的最基本释义是通过实践范畴所表述的哲学人类学定义，因为从中可以推断出所有关于人的判断。历史性以本体化的方式根植于人的实践本质中：一方面，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人为了满足需要，在改变自然界和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地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不断地创造新的思想、关系、制度、符号等。另一方面，新的需要的对象性活动形式，不断建构与之相应的社会存在的新形式。但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新事物转变旧事物，使之成为自身的基础。因此，人的现实的存在以否定的方式扬弃并保留了自身先前的发展成果，并在其内部发展过程中保持着相互关联。由于人的活动所形成的人与现实世界的连续不断的变革过程，即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本身。与此同时，人类的历史性实践植根于日常生活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通过分析封建制度日常生活的结构变化以及劳动组织变革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都直接浸润于日常生活中，换言之，社会存在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物质基础正是人类个体的日常活动。

以柳布金教授为核心的乌拉尔学派致力于在人道主义和人类学的路向上

发展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以研究哲学人类学、实践、历史现象、日常生活为目标，通过对人的存在形式的考察，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新的异化形式；发展唯物辩证法，尤其重视研究社会存在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关注主体与客体、认知、人道主义、宗教批判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范畴与方法，分析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

第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总结近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创造性劳动的新作用与经济转型的困境，在《全球资本》第五版的序言中提出了如下议题：（1）后期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式出现于30多年前，它回应了此前由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一种主要类型）和“现实社会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所带来的挑战。对寻求新社会经济制度的反应不是渐进的革命，而是反向的社会倒退：后期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获得了胜利（主要是在属于前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即外围和半外围类型的国家中）。（2）后期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胜利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方面是放缓了人的发展和物质生产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是能够促进资本加速向非生产性部门积聚的生产力率先获得了发展。获得增长的主要领域是金融、贸易和营销、中介、商业服务和休闲娱乐等部门。（3）创造性潜力集中于这些部门引发了生产力基本演化方向的改变。在四分之一多的世纪中，这种质变指向是：（1）创建、存储和传递信息；（2）为消费者创造并强迫其接受新体验（营销、广告、公关以及其他“创意服务”）。这些适于金融资本发展的生产力尽管进步缓慢，但还是给物质生产和人的发展带来了变化。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处于新层次上的最发达的经济体遇到的问题似乎比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更为严重：大规模的创造性劳动是可能且必需的，而以金融资本为主的现代资本形式不能保证其得到有效使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和人的发展），因而使其自身陷入萧条。

上述情形意味着生产力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1）劳动工具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自动化的机器人（电脑化）综合系统取代了机械机器系统（工业化工具），其特点在于从分散的过程走向加和的过程，而且能够实现快速转换。（2）劳动对象发生了变化：可再生的和（或）取之不尽的资源代替了不可再生的和有限的资源（循环利用、可再生资源替代碳氢化合物，无限的信息资源替代有限的实物资源等）。（3）劳动主体发生了变化：人从机械系统的附属物变成了创造性活动的主体；所有这些变化皆因它们具有的共同起源而结合在一起，这就是

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的深层的缘由——劳动内容的改变。生产力的新特点，乃至社会生产的新特点就在于它越是发展，劳动中的创造性内容就会越多。当创造性劳动普及开来，并扩展到社会生产的所有领域时，生产力就会发生质变，就会出现生产关系转型（至少是变革）的需求。

第三，俄罗斯左翼学者始终保持对当代世界范围左翼运动的深切关注与实践参与。2018年3月2日至4日在布达佩斯举行“抵抗大会”，来自13个欧洲国家（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法国、瑞典、西班牙）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主要议题包括：反对军国主义、战争和殖民政策的复兴；反对极右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对反社会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反击；寻求克服贫困的方法；寻求基于环境社会主义原则、民主和文化相互丰富原则向替代方案过渡的可能性；倡议在中欧、中东欧以及其他地区团结行动、组织协调。本次抵抗大会讨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状况。布兹加林强调，目前国内外政策没有任何的激进倾向，俄罗斯将无法真正面对北约霸权，因为这种对抗至少需要左翼与维和政治社会运动组织以及一些进步的国家政府。在中东欧地区只有通过具有组织包容性和大规模的社会自卫运动才能“推翻”专制政权。非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包括如下议题：（1）该地区几乎所有问题都根源在于中欧和中东欧国家没有系统性变化，其中形成了完全变异的所有制结构，导致私有财产“寡头化”，现有体系的变革应为更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创建广泛的公共团体，如在经济部门建立合作社，创造就业机会，向多部门混合经济转变。（2）社会领域应改善下层的生活条件，引入普遍的基本收入，除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对移民的迫害之外，抵抗运动最重要的社会任务，是通过加强大众教育和自我教育使文化革命扎根。（3）政治民主的概念应该以经济、环境和文化民主为补充，使每个人都成为“民主”的一部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概念，在中欧和中东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在国家宪法中宣布社会权利，保障每个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4）反抗资本主义的左翼政策的社会基础应该由民间社会的工会和自我组织组成。

五、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研究

匈牙利经济学家法卡斯（Peter Farkas）撰写的文章致力于分析马克思的

世界市场理论，预测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作者认为，马克思首先阐述了商品交换的逻辑和历史阶段：(1) 从自然经济的简单剩余交换；(2) 地域性物物交换（定期分工）；(3) 全国范围内的贸易活动到 (4) 国际关系，根据当时的术语，马克思主要是指国际贸易。但是，逻辑关系并不是以第四个步骤为终点。在作者看来，国际贸易即是交换发展的结果，在这个结果中同样包含着作为整体的世界市场的产生，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所有矛盾都展开了。尽管“世界市场”在形式逻辑的序列中处于最后位置，但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角度，它是“整体及其体系的前提”，²¹ 世纪“世界市场”是全球资本主义“整体”的先决条件，由技术发展和利润竞争驱动的资金集中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因此，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概念并不是指商品交换，而是生产和劳动分工在世界市场中的整体性、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积累，即全球范围内生产关系（财产和阶级）的总体，马克思“世界市场”内涵与当今的全球经济或全球化相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主导全球的、扩张性的生产方式，必然以世界秩序和世界体系为前提和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比社会理论领域的资产阶级学派更早也更为深刻的表明国际贸易和生产由于资本主义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国家权力发挥重要作用，在今天国际关系因素则具有更大影响力。马克思没有按照最初计划完成第五卷和第六卷的《资本论》。他打算详细描述国际贸易（“国际关系”）和“世界市场”的运作，即世界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人们可以重建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际化实际上构成了解释我们时代的国际关系的思想前提。

尽管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它的结构、功能和其他特征与列宁时代截然不同。列宁的《论帝国主义》作为宝贵的历史文献，反映了 20 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复杂图景，但却无法作为现代反资本主义或反帝国主义的行动指南。该书第一版于 1917 年 4 月在彼得格勒出版，二月革命后以《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专题出版。1920 年在德国和法国再版时“新阶段”被“高阶段”一词取代，反映了列宁对资本主义时代即将结束的更坚定的看法。列宁的写作灵感来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霍布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以及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霍布森认为，随着垄断的扩大，利润和储蓄份额增加，导致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以及出口资本、吸引外国投资和扩大帝国主义的需要。希法亭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将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联合为“金融资本”，

银行垄断资本的力量支配权显著增强了，布哈林试图将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这一现实理论化。在此期间，卢森堡撰写了《资本积累论》，强调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处于资本主义外围或边缘的非资本主义领域。然而，列宁没有直接依循上述理论家的任何立场，提出了自身独特的理论。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并非不可避免，可以与资本主义分开考虑。然而，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希法亭认为，既然帝国主义和垄断阶级深化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会遭到反抗，但是列宁却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更倾向于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资本出口国从剥削海外工人获得的“超级利润”被用来“贿赂”本国工人，从而促成了“劳工贵族”的出现。与列宁产生最大分歧的是卡尔·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观念，这意味着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卡特尔合作与和平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列宁还拒绝考茨基关于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的立场，并确信这个“最高阶段”反映了“寄生”、“腐朽”资本主义的终结，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强调了五个主要特征，是“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国际关系的复杂图景”。问题在于，这五个标志在21世纪初是否有效，并且在何种程度和形式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和相关的。在最普遍的层面上，列宁特别关注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直接联系是无可争议的，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由资本主义制度主导。然而，与列宁的期望相反，资本主义继续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发展。

第一，寡头垄断不仅在于它们的规模和集中程度，还在于其类型和结构。列宁时代的垄断，特别是在德国，以协会、辛迪加和卡特尔的形式出现。卡特尔决定了经营活动的产量、价格和领土水平。今天，除石油输出国组织外，几乎没有合法化的卡特尔。寡头垄断首先是参与世界各地竞争的跨国公司，以及新的巨型跨国公司，如谷歌、Facebook、优步等。除了规模之外，现代银行业和金融资本的活动性质与列宁时期大不相同，过去金融资本的活动主要是与工商资本互相联合，今天金融资本与工业和贸易关系不大，投资银行主要使用各种金融工具或衍生工具处理短期货币市场或一级和二级资本市场。这些银行参与证券、债券和货币兑换交易的持续交易。根据当时德国印刷媒体发布的估计，列宁认为证券交易所的价值会下降，但今天的证券交易所在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要。但今天的证券交易所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要。除银行外，所有类型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对冲基金和各种资本管理公司以及投资顾问都参与管理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证券，政府也参与其中。

许多工业寡头垄断，例如汽车工业，已经创建了自己的金融机构，并直接为其产品的销售提供资金，金融资本对工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其功能与希法亭和列宁所写的功能截然不同。

第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货币体系也经历了许多变革。列宁时代黄金与英镑的标准终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美元的主导地位，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采取浮动利率。

第三，资本出口与商品出口的差异。列宁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以资本出口为特征。国际劳动分工使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将巨大的“资本盈余”输出到国外“落后国家”。然而列宁所指出的前（旧的）国际分工已发生巨大变化，根据新的国际分工，欠发达国家不再仅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品的原材料供应商和市场倾销地，现代世界的大部分生产都是在欠发达国家进行的。为了通过许可协议最大化其利润、并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需要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子公司和附属公司之间分配生产流程。在列宁时期主要针对初级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高度多样化。第三世界国家跨国公司包括以下类型：（1）初级部门的出口导向型外国直接投资；（2）面向制造业的国内外商直接投资生产；（3）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4）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需要重视当前外国投资模式的基本特征：首先，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向较发达的工业国家；其次，最低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最不发达的国家，拥有大量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与将外国资本视为国家发展障碍的依附理论相比，列宁在马克思之后指出了外国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许多理论认为发达工业国家正在“去工业化”，因此，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资本输出导致了出口国自身的发展停滞，那么这只是以扩大和深化全世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代价的。在现代全球资本主义中大资本的“国内市场”是全球市场。资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剥夺了“资本输出”和“过剩资本”等概念的含义。

第四，垄断资本主义联盟之间的分裂。由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集中和流动，寡头垄断控制着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小公司集群网络，补充了它们的垄断地位。为了吸引这些公司进行投资，东道国政府都向其提供让步，包括降低税收和非工会劳动协议，在今天抵制寡头公司的垄断是更复杂和困难的过程。

第五，主要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瓜分世界。21 世纪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特征

是超级帝国主义的存在。一方面是美国，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间的合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益最多、受损最小的美国成为世界帝国主义的领导者，虽然在列宁的时代，英国比其他帝国更强大，但当时英国的地位与美国目前的霸权并无相似之处。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尽管历史上存在竞争，在欧盟和北约都是统一的，并且总体上符合美国政策，这种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并不能证实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尽管存在竞争，所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权力在维护和扩大资本规则方面是统一的，它们的战争不是针对对方，而是针对其他国家，七国集团是帝国主义间合作的典范。如果在过去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持和扩大资本规则而在国家层面创造了国家压制性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机构，那么资本全球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这种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等国际经济机构以及跨国银行和企业、欧洲中央银行、美国财政部、德意志联邦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等构成了全球资本的经济机构，北约和国防协议形成了压制性的手段。新自由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及其盟友的主流媒体构成了有组织的意识形态控制机制。总起来说，尽管帝国主义的基本性质仍未改变，但它在很多方面与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不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判断具有历史价值，但不能成为我们今天的斗争指南。要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向更高社会经济体系的过渡，还需要其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阿明具体分析和呈现了自己所提出的不平等概念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形式。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与早期社会形态差异的严谨科学分析，以私人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为起点（这种特征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所独有的，即使之前存在交换），特别是抽象社会劳动的出现以及抽象价值的支配权力。马克思引导我们理解无产阶级将他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并转变为资本积累的条件。抽象价值的主导地位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产生，它定义了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在此基础上，阿明关注不平等发展的概念与不同变革过程（革命性重组）的可能道路，认为革命从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而不是从其中心开始，并分析了两种模型，即革命路径和颓废路径的本质。

帝国主义的特点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加速的资本积累和系统中心的生产力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的边缘国家受到限制，发达和不发达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阿明认为需要区分两种本质不同类型的过渡，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另一种生产方式，如果这种转变无意识地发生，与整个自然变化相似，而意识形

态将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即“颓废路径”；如果意识形态成功地提供了全面而真实的理想革命可能，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的，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短暂阶段，列宁认为，革命性转变可能会从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或外围，即“薄弱环节”开始，即革命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仍不知道全世界资本主义并非其所表现出来的同质化发展，被征服的东方有机会打破僵局。发达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放弃了 19 世纪的革命传统，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发生在“一个国家”，同时意味着孤立地反击世界帝国主义，将面临双重挑战：（1）抵制永久战争或（2）成功地联合占大多数的农民推进社会主义新道路。

现代世界资本积累模型的根本目的在于分析中心—边缘社会经济体系的差别，注意这种差别是至关重要的。一般理论将着眼于社会结构的问题，以及对现代世界至关重要的其他方面，包括社会（特别是失业、就业不足和边缘化），以及思想政治（特别是公众意识、阶级意识、资源和人员激励、教育及其社会问题）等。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国家而言，决定性环节是第二部门（消费品生产）与第四部门（工业工厂的产品，在第二部门进行生产）之间的联系，这种界定是体系中心（欧洲、北美和日本）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特征。马克思表明，剩余价值增长率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客观（即必要）联系，即使这个模型看似抽象，但它反映了系统的本质。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对外部关系的抽象，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处于自给自足的体系中，而是系统中的主要关系可以通过对外部关系的抽象来理解。

世界体系外围积累模式的社会经济发展源于出口部门的创造性活动（受中心刺激），并对塑造市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外围收到构成不变资本（原材料）和可变资本（食品）主要要素的商品，其成本低于系统中心。出口部门与周边经济其他部分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并从廉价劳动力中获得较高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出口部门发展所产生的国内市场相对较小。通过扩大中心市场，整个世界体系（中心和边缘）的水平克服了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导致体系外围的不发达国家财富两极分化以及群众边缘化。垄断资本深度权力的新阶段，全球发展不平等正在生效。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垄断体系将生产系统降低到分包商的地位，转而支持增加垄断租金。这种垄断力量能够摧毁传统的左、右政党以及工会。这种权力结构，即现代边缘地区与传统帝国主义西方中心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恰恰是极权主义的当代形式。

任何社会演进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发展、扩展和衰退，资本主义在 18 世纪完成工业革命后，其生产方式固有的社会矛盾导致一次次经济停滞又一次次被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短期商业周期、长波和一般的或基本的系统性危机。短期商业周期包括交替的扩张和衰退阶段；整个周期持续数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积极的政府干预以及对借贷、利率、收入分配、政府支出等的控制，商业周期变得更加可控。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一经济模式运作良好是由于以下管理机制：（1）通过向上和向下的工资压力来调节企业之间的竞争（这种类型的监管同样适用于 1800 至 1880 年的资本主义竞争阶段以及随后的寡头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主要国家社会结构相对稳定；（3）国家控制货币供应和利率；（4）工业化中心国家与非工业化外围国家之间的区分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竞争对制度进行监管让位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历史妥协，这构成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基础，当周边地区开始在工业生产中竞争时，定期的经营周期性运动循环让位于更短、更平滑但更不规则的循环。

阿明认为，在严格经济术语中提出的周期性分析之外，对长波的研究要求扩展概念视域以涵盖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方面，分析工业革命后的“长波”（通常称为康德拉季耶夫波）及其生产、投资、价格、收入当影响因素，注意到以下四个波：1790—1814 年扩张 1814—1848 衰退；1848—1875 年扩展 1872—1893 衰退；1893—1914 年扩张 1914—1945 衰退；1945—1968 年扩张 1968 年之后的衰退，其中每个扩张阶段都符合技术创新和政治变革的相结合的趋势：第一次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建设铁路网络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电气化和殖民帝国主义；战后重建和欧洲和日本的现代化以及汽车文明的出现。19 世纪末大萧条使资本集中和资本集中化进程加速，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实质性变化，1800 年至 1880 年竞争性工业资本主义让位于寡头垄断资本主义。这些寡头集团的战略具有世界主义色彩，他们的竞争加剧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结束了早先英国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的瓜分。虽然旧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停滞（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增长加速），但经济衰退通常伴随着公司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主导。当前的长期衰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三个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的：（1）由于凯恩斯主义政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历史妥协形成了新的资本积累管理形式；（2）“苏维埃”是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从而刺激了

资本主义；(3) 试图在那些实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周边国家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当前的经济衰退是由于上述社会模式的逐渐消耗，特别是由于全球相互依赖的深化。自苏联体系崩溃以来，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无法抵抗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现代化模式，旨在减少外围大陆资产阶级对其原依赖中介地位的作用。当前经济衰退表现为资本过剩，解决经济衰退的方式旨在为金融资本提供有利可图的市场，主要目标是保护资本主义价值观，即使它对经济增长不利。这种资本市场的新霸权是以各种方式进行的，特别是浮动货币、利率、高利率等，美国国际收支的巨额赤字迫使第三世界国家为其外债提供服务。使世界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

与先前系统的稳定性不同，资本主义的历史充满了连续的扩张与衰退，其中一些是短暂的，一些是长期的，一些是微不足道的，一些是深层次的。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系统性危机的不稳定性也是它的优势：经济衰退之间的扩张阶段促进了该系统生产力超越先前阶级的加速增长。尽管资本主义不规则增长的破坏性显著，但却在短暂历史时期内改变了人类生存的条件。然而，正是因为它的发展呈指数增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稳定。资本主义注定要被超越，在此期间，生产力的积累将为更好地掌握自然和社会发展创造物质和人类的先决条件。

阿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世界资本积累法则，帝国主义制度的中心国家生产力积累和加速发展，与外围国家的滞后和瓦解，即发展和落后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建立对立两极的统一。边缘地区向社会主义过渡与民族解放没有本质区别，不可能由地方资产阶级领导，只能由农民和工人群众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心地区抗议资本主义关系的声浪非常响亮，但是却无能为力。向社会主义过渡有可能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但是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整体过渡。

六、社会主义作为未来文明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作为未来文明的方案》一文认为，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转型：(1) 英国工业革命建立了基于大工厂机器生产的新型社会关系；(2) 北美和法国的政治革命以人权和公民权利为基础建立了新的国

家形式；(3) 海地和拉丁美洲的反殖民运动；(4) 英国积极推进自由主义贸易政策；(5)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断进步，这导致了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以上社会进化要素在世界范围的发端成为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标志，以私人利益为中心的新的社会制度逐渐确立，摧毁了传统社会并将亚洲国家卷入其中，展开了全面的“世界变革”。

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就遭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抵抗，以革命和变革的方式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现实，包括工人和农民自组织的合作形式，革命组织的创建以及社会改革和全面民主化的发展等。事实上，这些尝试归结为三种方式：在现存系统中创造新的社会结构，以革命推翻现存系统和扩大社会保障机构。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激进的社会科学和政治创新，将各种方式有机地结合到一个新的范式中，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潜力的科学分析，强调社会主体（特别是无产阶级）及其政治自组织的能动性，以及基于自由人自由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愿景。目标是将科学方法与争取普遍解放的斗争实践相结合。

20 世纪见证了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和其他集体倡议的全面实施，作为第二次社会主义浪潮，由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和中国革命创造了以国家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有助于实现农业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确保获得快速和集约化发展，形成了独立的全球社会政治体系。然而，从长远来看，由于其资源效率和创新力不足，而屈服于自由市场关系的体系。社会民主的“第三条道路”取得了重大的社会进步，明显降低了社会不平等程度，但却无法将其成功转化为实现社会的全面经济民主化。新自由主义改革重新获得了掠夺性国家模式对福利国家的支配地位。

20 世纪的三次左翼运动形成了积极的经验。(1) 展示了计划之下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然而需要重视公司的独立性，其经济竞争力以及效率提高、创新潜力不应受到限制，而应符合社会规划的目的。(2) 混合经济体系可以成功地将公共的、集体的、合作的以及私营部门结合起来，有效的社会政策和民主体制具有社会的和人道主义的优势。这一体制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应对不断变化的价值观、提高个性化和灵活性，以及对于大型跨国经济集团和经济部门的依赖。(3) 集体和社区已成为探索新生活方式的典范，自由合作表现出极大的吸引力和巨大潜力。然而，如果其转变为封闭的社区，成员生活从属于集体时，这些原则就会失效。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分化，成为共

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思想基础，激发了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解放运动。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作为社会科学、左翼政治实践和争取普遍解放斗争的内在连贯性。

在 21 世纪初，人类文明的基本方面出现了转折，其规模与 18 世纪末的转折点相似，再次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所依赖的技术基础，影响到经济、政治、知识和国际生活领域。全球文明危机严重威胁了国家、区域以及国际关系的稳定、安全、合法性及其与未来之间取得新平衡的转型战略，高度竞争与合作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公司、社会运动和民间社会组织受到挑战。全球治理制度需要得到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创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寻找克服第二次浪潮局限的手段，即（1）寻求发展潜力；（2）“依附型”资本积累的前景；（3）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然而上述三点必须依赖下述条件才有可能：（4）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和美国生活方式的主导地位；（5）转型战略的发展。

就寻求发展潜力而言，资本主义将创新作为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其先决条件是不受限制地获取资源和保护财产权，劳动力、土地、原材料和知识被投入市场，采取货币形式作为工资、租金、利息或价格。这种异化有积极的一面，这使得“创造经济因素的新组合”成为可能，因此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支持创新进步和竞争的能力，创造新的发展形式。就资本积累和从属关系而言，资本主义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对投资和竞争的依赖决定了资本的主导地位，社会关系的运动是由积累逻辑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决于有能力通过发展政治制度来克服资本的统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先决条件在于（1）作为原材料的自然资源价值增加；（2）将部分劳动力转变为雇佣劳动力；（3）创建资本市场；（4）将知识和文化转化为私人资本所使用的资源。从自然、劳动商品、发达资本市场以及知识和文化的商品形式生产这四个主要领域的相互关联中衍生出（1）与自然的“代谢”交换；（2）个人、家庭和社区；（3）社会和政治机构和（4）文化领域，它们被“资本”所穿透并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货币和金融投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甚至情感”通过资本棱镜形成社会再生产的所有领域。因此，超越资本主义文明，需要从遭受异化、压迫和不平等的人的角度来制定后资本主义文明战略：（1）生态问题：如何恢复和保证自然环境的稳定繁衍；（2）社会问题：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及其条件；（3）民主与和平问题：改变社会制度、权力与财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和生活安排，使最受压迫社会群体的成员能够自由选择生活条件。抑制国际关系的

军事化，扩大内部监督，使弱势群体拥有自由、避免暴力；(4) 文化问题：为底部社会阶层提供知识和文化价值。

为了向新文明过渡，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具体实践依赖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协同潜力：环境、社会、民主和文化。从历史上看，当各种运动、冲突和倡议相互作用时，促进了相互转换，导致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中国社会主义、西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左翼运动在替代后资本主义文明过程中可以寻求共同点。

后期资本主义时代典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阶段，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社会主义关系的元素以及“自由王国”的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向前发展。现代生产力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这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以及后来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中一直被当然地视作发展新型社会生产的充分的物质基础。这是适应物质生产的变化并构成技术进步主要空间的创造性劳动内容和创造性领域的发展。现有的市场、货币和资本的形式无法保证这种潜力的充分实现，而且会把经济引向虚拟品的生产，并使经济中无用（扭曲）部门得到扩张。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试图走向融合，这正是对这种矛盾的反应。另一种选择是，至少要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体系进行深刻的变革，增加而非降低其社会化程度，最大限度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